

《姿态人生》中的记忆伦理与历史重构

Ethics of Memory and History Reconstruction in *A Gesture Life*

张国庆 (Zhang Guoqing)

内容摘要: 美国韩裔小说家李昌来的小说《姿态人生》借一个二战日军军医的回忆再现了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性奴隶的朝鲜“慰安妇”的悲惨历史，展现了记忆伦理、身份建构与宏大历史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二战日军军医选择的伦理身份影响了他的记忆与遗忘，造成了身份危机，他对于被压制记忆的回忆使他得以重构身份。《姿态人生》以二战见证者和受害者的双重叙事再现朝鲜“慰安妇”的历史，证实了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强征、奴役和屠杀“慰安妇”战争罪行，挑战了日本有关“慰安妇”的官方历史，重构了朝鲜“慰安妇”历史。二战日军军医对朝鲜“慰安妇”历史的回忆和李昌来以文学形式再现朝鲜“慰安妇”历史体现了记忆伦理。

关键词: 《姿态人生》；记忆伦理；朝鲜“慰安妇”；身份重构；历史重构

作者简介: 张国庆，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小说和记忆理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批号：21&ZD28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s of Memory and History Reconstruction in *A Gesture Life*

Abstract: Korean American novelist Chang-rae Lee's novel *A Gesture Life* presents through the memory of a Japanese army medic the miserable history of Korean comfort women forced into sexual slaves by Imperial Japanese Army during WWII, demonstra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of memory,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grand history. The ethical identity chosen by the Japanese army medic influences his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leading to his identity crisis.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repressed memory helps to reconstruct his identity. *A Gesture Life* uses the dual narratives of war witness and victim to represent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 history and attests to Japanese government's war crimes of forcibly enlisting, enslaving, slaughtering comfort women during WWII, thus challenging the Japanese official versions of comfort women history and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Korean comfort women. The Japanese army medic's memory of and Chang-rae Lee'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 history

embody the ethics of memory.

Keywords: *A Gesture Life*; ethics of memory; Korean comfort women;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history reconstruction

Author: **Zhang Guoqing**, Ph.D. in Literature, is currently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and memory theory (Email: zhangguoqing287@163.com).

美国当代韩裔作家李昌来 (Chang-rae Lee, 1965-) 的小说《姿态人生》 (*A Gesture Life*, 1999) 出版后佳评如潮, 荣获《纽约客》小说图书奖、美国亚裔文学奖等奖项, 作家本人也被《纽约客》杂志评为20位40岁以下的最佳作家。这部小说采用记忆书写的形式呈现主人公美籍日裔秦医师二战期间作为日军军医的战争经历和二战后移民美国成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移民生活。秦医师的回忆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跳跃、在亚洲战场与美国郊区小镇之间切换。学界关于该小说记忆书写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创伤记忆和记忆再现策略¹, 鲜少有研究关注记忆伦理、身份认同与历史重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学者贝琳达·孔 (Belinda Kong) 指出《姿态人生》“运用老年移民人物的回忆视角给亚洲的历史叙述穿上记忆现实效果的外衣” (2)², 但未探讨记忆伦理与身份认同、宏大历史间的关系。本文将该小说置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之下, 探讨伦理身份与记忆选择之间的关系、记忆伦理与历史重构之间的关系, 指出主人公选择模范少数族裔的身份而压制二战记忆和家庭不和的记忆引起了身份危机; 主人公回忆被遗忘的人生经历构成完整的记忆链条, 有助于重构个人身份; 作为战争亲历者和见证者的主人公关于朝鲜“慰安妇”被奴役、压迫和残害的记忆体现了他的记忆伦理, 挑战了日本关于“慰安妇”的官方历史, 以文学形式重构了关于朝鲜“慰安妇”的历史。

一、记忆选择与身份危机

记忆与个人身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德国哲学家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和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等人都指出记忆“保障身份认同”的

1 参见 Alexis Motuz, “Before Speech: An Interrogation of Trauma in Chang-rae Lee’s *A Gesture Life*,”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3 (2013): 411-32; Christopher Lee, “Form Giving and the Remains of Identity in ‘A Gesture Life,’”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1 (2011): 95-116; Hamilton Carroll, “Traumatic Patriarchy: Reading Gendered Nationalism in Chang-rae Lee’s *A Gesture Life*,”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 (2005): 592-661.

2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功能。¹可见，记忆是个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压制记忆和有意遗忘会影响身份认同，甚至引发身份认同危机。《姿态人生》的主人公秦医师曾是一名二战日军军医，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移民美国纽约附近的白人郊区小镇贝德莱（Bedley Run），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商店，白手起家，跻身中产阶级，成为遵纪守法、事业有成的模范少数族裔。他一直未婚，收养来自韩国的孤女珊妮（Sunny）。秦医师具有犯有战争罪的二战日军军医的职业身份、美国白人眼中的模范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和珊妮养父的血缘身份等多重伦理身份。小说开篇，退休后的秦医师坦言他的身份危机，“时不时地，我会忘记自己是谁”（285）²。他的身份危机在于选择建构模范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而压制遗忘二战战争记忆和家庭不和的家庭记忆，否认二战日军军医身份和珊妮的养父身份，造成个人身份不完整，引起身份危机。

“人类的回忆总是受到极端的主观感知和选择以及回忆者当下的行动需要的影响”（巴勒斯 贝克290），秦医师选择模范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影响了他的记忆与遗忘的内容。出于建构模范公民身份的目的，秦医师压制二战的战争记忆和强迫养女堕胎导致父女关系破裂的家庭记忆，筛选、加工和重构与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相符合的记忆。他对二战经历闭口不提，对离家出走、音讯全无的养女也讳莫如深，甚至他的养女对他的过去也一无所知，很多小镇居民甚至不知他有女儿。秦医师根据模范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重构的记忆造成了记忆的断裂和个人历史的中断。记忆是个人“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57），二战战争记忆与家庭不和记忆的缺失必然影响秦医师的身份认同，造成二战日军军医的职业身份和养父身份的缺失，使他坠入身份危机的深渊。

记忆的断裂和缺失造成了秦医师的身份危机，而秦医师选择的模范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身份危机，因为“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使亚裔与主流规范和理念疏远的同时，也与自身疏远”（Eng and Han 677），结果是“他用美国亚裔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取代‘自我’”（Motuz 423），陷入了身份危机。“人的身份就是伦理身份”（聂珍钊 264）。“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聂珍钊 264）。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的选择驱使秦医师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训。模范少数族裔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流社会给亚裔移民的标签，表面上肯定了亚裔移民的遵纪守法、勤俭上进、道德高尚、经济小康，实际上却发挥了规约性作用，要求亚裔移民认同并遵守美国社会“主导的规范和理念”，包含“白人性、异性恋和中产阶级家庭观”（Eng and Han 670）。秦

1 参见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5页。

2 本文有关的引文均来自 Chang-Rae Lee. *A Gesture Life* (New York: Riverhead, 1999)，以下只标标准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医师“承认并尊重”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规则，热心公益、主动融入白人社区、与邻居保持友好疏离的关系，“这使他很快获得了邻居们的接受”（44）。他对“中产阶级家庭观”的认同使他建立“名声好、以幸福出名的秦家”（204）定为奋斗目标，因而任何可能威胁这一目标的行为都会被扼杀。这也解释了秦医师在得知十七岁的养女未婚先孕的出离愤怒及强迫即将临盆的养女堕胎的行为。在看到身怀六甲、惶恐无助的女儿回家向他求助时，秦医师感到的不是对女儿的心疼与怜惜，而是“即将来临的耻辱和尴尬，就像悬挂在房子上的宣告我们共同失败的旗子”（340）。在秦医师看来，“共同失败”就是他努力建构、视若珍宝的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的失败。

《姿态人生》运用姓名隐喻秦医师的身份危机。移民美国后的秦医师改名富兰克林·秦（Franklin Hata）¹，富兰克林是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字，这象征秦医师建立新身份的美好愿望；可是他的美好愿望破灭：小镇居民用不符合英美称呼习惯的秦医师称呼他。他无法掌控身份，他感叹：“许多年前，一些顾客和其他商人这么叫我，然后人们就一直这么叫了。我希望不是这样，但似乎没有人想叫我富兰克林”（45）。“秦医师”的称呼表明他建构的新身份未被美国主流社会承认。承认对于个人身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认同（identity）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泰勒 290），美国主流社会不承认秦医师建构的新身份加剧了他的身份认同危机。

为了建构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秦医师压制与之矛盾的二战战争记忆和父女不和的家庭记忆，造成个人记忆的断裂，身份的不完整，引起身份危机；而他选择的模范少数族裔的身份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加剧了他的身份危机。

二、记忆回忆与身份重构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认为个人既是“当下的自我”，也由“对过去的思想、行为、经历等进行回顾的意识”（Clift 49）构成。换言之，个人身份包含过去的身份和现在的身份，缺一不可。秦医师要走出身份危机、建构完整的身份，就是要回忆二战战争记忆和家庭记忆、使记忆的链条完整，在此基础上承认被否认的二战日军军医的职业身份和珊妮的养父身份，构建完整统一的个人伦理身份。

回忆压制多年的二战创伤记忆，重构二战日军军医职业身份既是秦医师疗愈二战创伤的治疗过程，也标志着秦医师开启重构个人身份之旅。秦医师虽绝口不提二战记忆，但他的战后生活却笼罩在二战的创伤记忆阴影之下。“潜存心底的创伤经验不是被动蛰伏，而是时常主动地以梦魇、幻觉、闪回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突袭受创者”（Caruth 11）。秦医师关于二战的重复

1 秦医师不仅取了英文名富兰克林，还将姓从 Kurohata 改为 Hata。

的噩梦和关于K出现的幻觉就是二战创伤记忆的表征。回忆不愿面对、难以面对的创伤性的二战记忆、直面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虽是秦医师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做出的伦理选择，但他含混、跳跃的回忆反映了他矛盾痛苦的心理和内心深处撇清战争罪行的强烈愿望。秦医师关于二战经历的几次闪回拼凑出他的二战记忆。二战末期，秦医师是在太平洋战场服役的日军军医，负责管理日军军营的朝鲜“慰安妇”，与“慰安妇”K产生了亲密关系。K请求秦医师结果她的性命以避免更可怕的遭遇，秦医师予以拒绝，K最终惨遭其他日军的屠杀和肢解。秦医师虽不是K惨死的直接凶手，但他拒绝K的求救使他成为帮凶，这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向读者讲述的叙事记忆。叙事记忆“在小说中的表达具有‘治愈’的功能”（孔瑞 85）。回忆并讲述难以面对、难以言说的创伤记忆对秦医师而言不仅具有疗愈创伤的功效，也是他重构建立在二战记忆之上的二战日军军医职业身份的重要前提，标志着他朝完整的个人身份迈进一步。

回忆被压制的家庭记忆、主动修复破裂的父女关系使秦医师得以重构父亲身份，完成身份重构。懊悔是促使秦医师讲述不和的家庭关系、化解父女矛盾的情感动机。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特·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认为懊悔（remorse）是悔罪的重要因素，“它能够改变我们对过去的解释”（199），并促使心生懊悔之人采取行动弥补过去的错误。当秦医师从朋友口中得知离家数年的养女珊妮带着儿子托马斯（Thomas）回到小镇生活，他既惊又喜，但也被深深的懊悔感折磨，决定采取力所能及的行为修补破裂的父女关系。他为多年前强迫养女堕胎给她造成伤害的行为向她道歉，承认“都是我的错”（337），化解父女间多年的心结。满心懊悔的秦医师还认为他对养女单身母亲、经济拮据的人生境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竭力弥补当年的过错：主动帮助照料年幼的外孙，奋不顾身跳入游泳池救出陷入危险的外孙；将出售房子的可观资金留给养女及外孙改善生活。秦医师直面过去记忆、承认错误、弥补亏欠的行为换得了养女的原谅、外孙的接纳和养父身份的重构。名字代表了“独一无二的、有连续意义的”（Friese 20）生命个体，名字是将个人与他人区分开的重要身份符号，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同名的外孙托马斯用“富兰克林”而非“秦医师”称呼秦医师，象征着美国社会对秦医师重构的新身份的承认和接受。

《姿态人生》中多次出现的房子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小说用秦医师与房子之间的关系比喻秦医师困难重重的身份重构过程。小说开篇就点出秦医师与房子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秦医师自豪地告诉读者他位于白人社区的“双层都铎式房子”虽不是“小镇最宏大的”，但是“本地区最特别的房产之一”（16）。这所房子是他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的象征。然而秦医师也坦言他“自己打造的可爱的”房子却“开始令他心烦意乱”，他感到“用尽了房子”，“要比以前更接近出售房子了”（21），这隐喻了秦医师建构的模范

少数族裔身份令他陷入了身份危机。“房子既是成功同化叙述的投射，也是深层失败的具象化”（Motuz 427）。这所房子既是秦医师选择的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的象征，也是他移民美国后重构身份失败的标志。秦医师在房中点燃过去的文件、照片引起房子失火象征着秦医师压制过去记忆、否认日军军医身份和养父身份的行为是徒劳的，暗示了日军军医身份和养父身份是他个人伦理身份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否认过去身份会引发身份危机。小说用秦医师维修外表可爱、但内在老化的房子比喻秦医师重构身份的努力。珊妮离家出走后，秦医师“在空闲时间维修房间（……）直到整个工程完成地令人满意”（14-15）。小说结尾，秦医师虽出售比喻其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的房屋，却感到“我几乎回家”（358）。秦医师的“回家”象征其身份危机的化解和身份重构的完成。

回忆被压制多年的二战创伤记忆和战后家庭不和的记忆是秦医师做出的伦理选择，是他化解身份危机、重构身份的努力。秦医师“把记忆重新放回对将来的期望和当下的现在的相互关系之中”（利科 21），重构连续、完整、统一的记忆链条，在此基础上统一了二战日军军医的职业身份、珊妮的养父身份和模范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重构了个人身份。

三、记忆伦理与历史重构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因记忆内容、记忆主体和记忆呈现方式体现了伦理选择而将记忆“归于伦理的范畴”（8），并提出“记忆伦理”的概念。“记忆伦理既是关于遗忘的伦理也是关于铭记的伦理”（Margalit 17）。“记忆伦理正是记忆所投射出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选择”（高建荣 90）。秦医师回忆二战经历、承认战争罪行是他在铭记或遗忘朝鲜“慰安妇”历史之间进行的伦理选择，属于个人的记忆伦理。他的回忆证实了二战日军对朝鲜“慰安妇”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有力驳斥了日本政府关于朝鲜“慰安妇”的弥天大谎，重构了关于朝鲜“慰安妇”的宏大历史。

《姿态人生》运用朝鲜“慰安妇”见证者和受害者的双重叙事再现朝鲜“慰安妇”被奴役、压迫和戕害的历史，挑战日本政府否认强征、奴役和屠杀朝鲜“慰安妇”的宏大历史。身为二战日军军医的秦医师既是反人道、反伦理的“慰安妇”战争罪行的执行者，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慰安妇”罪行的见证者。他的回忆再现了朝鲜“慰安妇”被奴役、侵犯和迫害的历史事实，揭露了二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暴行，揭示了二战日军如何美化“慰安妇”制度，掩盖战争罪行。在秦医师服役的日本军营中，七名“慰安妇”少女要服务整个军营，她们稍有不从、反抗就会遭到轻则毒打，重则屠杀。秦医师名义上是负责照料“慰安妇”的身体健康，但实则是为了确保她们身体健康，不会将疾病传染给日本军人。二战日军从两个方面掩盖“慰安妇”的罪恶本质。一方面，日军操纵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宣传“慰安妇”是义

务和奉献，向军民灌输“慰安妇”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获取民众的支持：“慰安妇”“和所有人一样奉献和牺牲”（180），因而“慰安妇”制度被视为“一种惯例”，“每个人都认同用年轻妇女来维持作战军官和士兵的士气的逻辑”（163）。另一方面，日军运用欺骗性语言混淆视听，掩盖“慰安妇”的罪恶本质，用“战时女子挺身队”指代“慰安妇”，用“慰安室”和“欢迎屋”（105）指代性犯罪现场。因为“故事的真实性可以由观察者予以见证”（江守义 23），所以秦医师见证者的身份证实了“慰安妇”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历史。

《姿态人生》还运用受害者“慰安妇”K的亲身经历揭露“慰安妇”沦为日军性奴隶的悲惨处境，驳斥了日本政府否认强征“慰安妇”的谎言，重构了关于朝鲜“慰安妇”的苦难历史。家道中落的K姐妹在日军招募鞋厂工人的幌子下代替弟弟应征，却被运送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军营中，沦为任人宰割的“慰安妇”。日军“慰安所”正是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笔下“将人类个性（……）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灭绝人和使人类丧失尊严”（548）的灭绝营。在“慰安所”，“慰安妇”被剥夺主体性，被物化为“柔软的肉条”（251）和“监督和管理的稀缺物品”（268）。她们沦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神圣人”（homo sacer），被弃置在法律保护之外，“被剥夺一切权利，而施害者没有犯谋杀罪”（103）。K姐妹惨死于日军之手，凶手却逍遥法外。K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想要的就是我的性”（300），揭露了“慰安妇”是被日军强征的性奴隶的事实真相，揭穿了日军招募工厂女工的谎言。K的经历证实了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参与强征朝鲜“慰安妇”的行为，因为“对于一个女性被侵害、被控制、被侮辱、被作为私有财产或奴隶对待的国家，该国政府必定在运用体制性的性侵害为其国家统治服务”（Stetz 19）。“慰安妇”K悲惨的个人历史是无数朝鲜“慰安妇”悲惨命运的缩影。

秦医师的回忆叙述从见证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视角呈现朝鲜“慰安妇”沦为日军性奴隶的悲惨境遇，揭露了二战日军的滔天罪行。二战期间，为了满足迅速扩张的日军对于“慰安妇”不断扩大的需求，日本要求朝鲜总督府征集“12至40岁的未婚女子”组成“女子挺身队”（陈丽菲138）¹，更在1944年8月正式实施“女子挺身勤劳令”，“使征集‘慰安妇’完全合法化”（陈丽菲140）。日军以招募“工厂女工”、“随军护士”等人员的名义欺诈、诱骗贫苦的朝鲜女性或采取抓捕、强掳等暴力胁迫的方式征集朝鲜妇女为“慰安妇”，“受害者约为16万人”（苏智良 姚菲 陈丽菲 17）。这些不幸的朝

1 “女子挺身队”是日军用于指代“慰安妇”的名称。1905年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女子成为日军随军“慰安妇”的一个重要来源。日本军部向朝鲜总督府发布命令征集朝鲜“女子挺身队”，由朝鲜官员采用强征或欺骗的手段征集“慰安妇”。朝鲜“慰安妇”多为年轻的未婚女子。参见 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7-192页。

鲜“慰安妇”被日军运送至硝烟弥漫的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场，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对于二战期间以暴力或诱骗的方式从朝鲜征集“慰安妇”的战争罪行保持回避态度，否认战争罪行，拒绝道歉和赔偿。秦医师的回忆“扮演批判的、颠覆性的功能记忆的角色”（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152），挑战日本关于“慰安妇”官方历史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推动对于历史真相的挖掘。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将记忆伦理分为微观伦理（个人的伦理）和宏观伦理（集体的伦理）。¹小说中，秦医师回忆并讲述二战经历所体现的记忆伦理属于微观伦理，他的回忆给予被遗忘的朝鲜“慰安妇”K讲述个人悲惨历史的机会，挑战了日本关于朝鲜“慰安妇”的官方历史。他的个人记忆还涉及到二战朝鲜“慰安妇”的集体历史，因而后人如何对待这一黑暗残暴的历史记忆则属于宏观的记忆伦理。身为1.5代²美籍韩裔的李昌来对朝鲜“慰安妇”历史一无所知，直到20世纪90年代太平洋两岸声势浩大的“慰安妇”追责运动，才得知了这段朝鲜女性被侵犯、奴役和戕害的骇人听闻的历史，深受触动的李昌来以文学形式再现被忽视、否认和遗忘的朝鲜“慰安妇”历史，重构了关于“慰安妇”被强征、被奴役和杀害的黑暗历史。李昌来的文学创作不仅体现了他的道德感、责任感和正义感，还反映了他对于朝鲜民族苦难、屈辱的近代历史的深切关注，更关乎民族、国家和全人类对苦难历史和人道灾难的反思，及对于受权力利用、操纵和篡改的历史记忆的审视。个人、民族、国家和全人类在选择记忆或遗忘难以面对、难以言说的暴力、苦难的历史事件的态度体现了他们的记忆伦理，他们的记忆伦理是对暴力历史受害者身份的承认与铭记。铭记、保存与传递关于沉默的历史受害者的记忆，避免他们因为权力的刻意操纵而湮没在时间洪流中，这既是个人也是集体应具有的记忆伦理，唯有如此，方能再现历史真相，给予受害者应得的正义。

作家“有立场的记忆书写可以（……）增进人类群体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历史错误的修正”（赵静蓉 132）。二战结束后，“慰安妇”历史几乎沦入忘川，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三名韩国“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要求道歉与赔偿，之后“慰安妇”受害者对日诉讼案件逐渐增多，罪恶滔天的“慰安妇”历史才重见天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籍韩裔作家李昌来、诺拉·玉子·凯勒（Nora Okja Keller）和特丽丝·朴（Therese Park）都是在这场“慰安妇”追责运动中才得知骇人听闻的朝鲜“慰安妇”历史。³这些美籍韩裔作家出于作家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以朝鲜“慰安妇”为创作题

1 参见 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2 1.5代移民指在外国出生、未成年时移民美国的一代人。

3 诺拉·玉子·凯勒（Nora Okja Keller）在1993年韩国“慰安妇”幸存者在美国的讲座中才得知朝鲜“慰安妇”历史，参见 Hong, Terry. “The Dual Lives of Nora Okja Keller: An Interview.” *The Bloomsbury Review* Sept./Oct. (2002): 13-14.

材，分别创作了小说《姿态人生》《慰安妇》（*Comfort Woman*, 1997）和《天皇的礼物》（*A Gift of the Emperor*, 1999），将沉默的朝鲜“慰安妇”群体纳入观照视野，将几乎湮没在历史海洋中的朝鲜“慰安妇”历史转化成持久的文学记忆和文化记忆，既以文学形式重构了有关朝鲜“慰安妇”的历史，也唤起世人对“慰安妇”受害者的关注和这段罄竹难书的暴力历史的反思。铭记历史、传递记忆、探求真相不仅对于暴力历史的受害者发出声音、获得关注、伸张正义意义重大，也关系着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未来，唯有铭记历史、传递记忆，方能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的重复。

Works Cited

-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
-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translated by Lin Xianghua.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Assmann, Aleida.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translated by Pan Lu. Beijing: Peking UP, 2016.]
- ：“回忆有多真实？”，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7-74。
- [—.“Der lange der Vergangenheit-Erinnerungskultur und Geschichtspolitik.” Translated by Ji Bin, Wang Lijun and Bai Xikun. *Das soziale Gedächtnis: Geschichte, Erinnerung, Tradierung*, edited by Harald Welzer. Beijing: Peking UP, 2007. 57-74.]
- 米切尔·巴勒斯、多罗塞·贝克：“回忆的模仿”，甄飞译。《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冯亚琳、埃尔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74-292。
- [Basseler, Michael and Dorothee Birke. “The Mimesis of Memory.” Translated by Zhen Fei. *Materialbuch zur Gedächtnisforschung*, edited by Feng Yalin and Astrid Erll. Beijing: Peking UP, 2012. 274-292.]
- Carroll, Hamilton. “Traumatic Patriarchy: Gendered Nationalism in Chang-rae Lee’s *A Gesture Life*.”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 (2005): 592-616.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P, 1996.
- 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Chen Lifei. *Critique of Japanese Comfort Women Syste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 Clift, Sarah. *Committing the Future to Memory: History, Experience, Trauma*. New York: Fordham UP, 2014.
- Eng, David L. and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4 (2000): 667-700.

- Friese, Heidrum. *Identities, Time, Difference and Boundaries*. New York: Berghahn, 2002.
- 高建荣：“《同情者》中的记忆伦理与身份重构”，《外国文学研究》3（2022）：89-99。
[Gao Jianrong. “Ethics of Memory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 *The Sympathize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3 (2022): 89-99.]
- Garner, Dwight. “Adopted Voice: An Interview with Chang-rae Lee.” *The New York Times Review* 5 (1999): 6.
- Hong, Terry. “The Dual Lives of Nora Okja Keller: An Interview.” *The Bloomsbury Review* Sept./Oct. 2002:13-14.
- 江守义：“伦理视野中的小说视角”，《外国文学研究》2（2017）：20-28。
[Jiang Shouyi. “Perspectives of Novels in View of Ethic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2 (2017): 20-28.]
- Kong, Belinda. “Beyond K’s Specter: Chang-rae Lee’s *A Gesture Lif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and Asian American Transnational Aesthetics.”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1 (2011): 1-29.
- 孔瑞：《“后9·11”小说的创伤研究》。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Kong Rui. *Trauma in Post-9/11 Novels*. Beijing: Beijing Jiaotong UP, 2015.]
- Lee, Chang-rae. *A Gesture Life*.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9.
- Lee, Christopher. “Form Giving and the Remains of Identity in ‘A Gesture Life.’”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1 (2011): 95-116.
-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2002.
- Motuz, Alexis. “Before Speech: An Interrogation of Trauma in Chang-rae Lee’s *A Gesture Life*.”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3 (2013): 411-432.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保罗·利科：《过去之谜》，綦甲福、李春秋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Ricoeur, Paul. *The Riddle of the Past*, translated by Mu Jiafu and Li Chunqiu. Jinan: Shandong UP, 2009.]
- Stetz, M. D. “Teaching ‘Comfort Women’ Issues in Women’s Studies Courses.” *Radical Teacher* 66 (2003): 17-21.
- 苏智良、姚菲、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
[Su Zhiliang, Yao Fei and Chen Lifei. *A Study of Comfort Women Enlisted by Invading Japanese Army*. Beij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16.]
- 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琳、陈燕谷译。《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290-337。
[Taylor, Charles.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Translated by Dong Zhilin and Chen Yangu. *Cultures and Publicity*, edited by Wang Hui and Chen Yang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290-337.]
-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Zhao Jingrong.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